

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与自尊的中介作用

刘杨¹, 李泽¹, 林丹华²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系, 北京 100191;

2.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875)

【摘要】 目的:考察社会支持、自尊在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中的共同中介作用。**方法:**应用问卷调查法对来自北京、广州、福州三地的386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测查。**结果:**①受教育程度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的歧视要低于受教育程度低的新生代农民工;②在加入社会支持、自尊两个变量后,歧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不再显著($\beta=-0.05$),同时和单独考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时相比,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部分影响效用为自尊所中介。**结论:**歧视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路径为歧视→社会支持→自尊→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相比,自尊是更为核心的中介变量。

【关键词】 歧视; 新生代农民工; 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 自尊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3)06-1013-04

Discrimination and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LIU Yang, LI Ze, LIN Dan-hua

Psychological Department of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 School, Bei 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between discrimin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Methods:** A sample of 386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ere selected to complete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①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with the higher education degree got fewer discrimination than those with lower education degree. ②When considering the combined mediation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the effect of discrimination on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no longer significant ($\beta=-0.05$). Self-esteem was also the mediation variable in the social support and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clusion:** The effect path of discrimination on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is: discrimination→social support→self-esteem→subjective well-being. Compared with social support, self-esteem is a more important mediation variable.

【Key words】 Discrimination;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support; Self-esteem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农民工,亦称第二代农民工^[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与日俱增。全国总工会2010年6月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为1亿人左右,在农民工群体中占据六成的比率,约为我国在城职工人数的一半^[2,3]。国内以往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多关注焦虑、抑郁、犯罪行为等负面的心理健康指标^[4],对其主观幸福感等正向的心理健康指标研究较少^[5]。而对其开展研究能更客观、全面地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发展状况,有效地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对于提升新生代农

民工乃至整个城市的幸福指数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量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经历了很多歧视^[6],这些歧视损害并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7]。歧视领域内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亦表明,遭遇歧视的个体并不一定会具有较差的心理健康状况,如胡伟等人^[8]以328名农民工为被试的研究表明,经常使用积极的逆境评价策略可以缓解歧视的负面作用,从而让被试具有较好的心理适应水平。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可能在歧视和心理健康诸变量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中间变量,这些变量会调节或中介歧视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因此,探索并分析在歧视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间发挥作用的中间变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中间变量的作用机制,降低歧视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新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CSH028);工信部基本科研业务费(30420110825)

通讯作者:林丹华

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

应激CPT理论^[9]及以往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社会支持、自尊即是这样的中间变量。研究者们亦对它们在歧视与心理健康中的作用方式进行了探讨。研究者们认为,社会支持和自尊在歧视与心理健康中发挥中介作用。如Prelow^[10]的研究认为,个体感知的社会支持在种族歧视与抑郁、生活满意度中间发挥中介作用,种族歧视严重地损伤了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从而提升了个体的抑郁水平,降低了个体的生活满意度。Clare的研究^[11]认为,自尊在种族歧视与抑郁症状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遭遇种族歧视的个体的自尊水平会有所下降,这种低自尊会增强个体的抑郁症状。

已有研究结果明晰了社会支持、自尊各自在歧视与心理健康中的作用方式,但社会支持与自尊存在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12]又让我们产生了新的疑问:这种考察社会支持、自尊独立作用的方式是否能充分阐释歧视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已有关于多中介变量模型的研究^[13]认为,应当将存在复杂关系的多个中介变量放到同一理论模型内加以研究,这更有利于理解歧视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同时,相关研究也表明,当把几个存在复杂关系的中介变量放到一个理论模型内时,它们各自的作用方式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有的变量可能会成为更为核心的中介变量^[9],有的变量的中介作用可能会消失^[14]。故此,将社会支持与自尊放置于同一理论模型进行考察,并对它们的作用做出明确的阐释有助于深入理解歧视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个体与环境交互理论^[15]认为,个体的发展取决于环境变量与个体变量的交互作用,而环境变量最终要通过个体变量来发挥其作用。歧视拒斥理论^[16]亦表明,歧视的环境会损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缺失会从根本上会损伤个体的自尊,从而引发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关的实证研究^[12]结果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自尊是感悟的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变量,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通过自尊来发挥作用。在这样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基础上,我们推断,歧视、社会支持、自尊及主观幸福感可能会存在如图1所示的理论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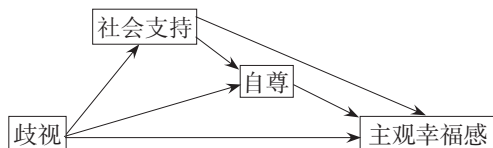


图1 歧视与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与自尊作用图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本研究在北京、广州、福州三地选取了386名出生于19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被试。其中:北京239人(62%),福州120人(31.1%),广州27人(6.9%);男性211人(54.7%),女性147人(38.1%),性别信息缺失28人(7.3%);初中及以下学历172人(44.6%),初中以上学历203人(52.6%),受教育程度信息缺失11人(2.8%);已婚289人(74.9%),未婚85人(22%),婚姻状况信息缺失12人(3.1%),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3.31 ± 4.26 岁。

1.2 工具

1.2.1 感知到的歧视问卷^[17] 采用Richard编制的歧视量表(Stigmatization Scale)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歧视状况进行测查,本研究结合前期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结果对原问卷进行了修改。问卷列举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会遭受到的16种歧视情况,通过询问被试所描述的句子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来测查其知觉到的歧视的情况。该问卷为5点计分,1为“一点都不符合”,5为“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感知到的歧视越多。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0.78。

1.2.2 社会支持问卷^[18] 本研究采用Ward所编制的旅居者社会支持量表(The Index of Sojourner Social Support Scale)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测查。该量表原用于测量旅居者社会支持的状况,本研究根据前期访谈研究中呈现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对该量表进行了一些修改,首先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认知特点将计分方式改为四点计分,对分数的描述方式也进行了简化:“1”为“完全没有”,“4”为“总是”,其次增加了社会支持的来源程度的测查,将量表改为三个“家人”、“朋友/老乡”、“领导/雇主”社会支持来源的分量表。社会支持的总分为三类来源的总分之和。修订后的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分别为0.94、0.92、0.93。

1.2.3 自尊问卷^[19] 本研究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自尊水平的测查工具。该量表包括10个条目,用以评定个体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均分越高说明自尊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0.53。

1.2.4 主观幸福感问卷^[20] 本研究采用Bradburn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问卷——情感平衡量表》来对评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该量表共10道

题,采用“是、否”的计分方式,“是”计1分,“否”计0分,第2、4、6、8、10反向计分。总分在0~10之间,分数越高表示主观幸福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为0.69。

1.3 程序

采用一对一施测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主试均为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正式施测前,由课题负责人对所有主试进行培训,对指导语、问卷内容、以及施测注意事项进行详细讲解。具体施测时,由主试向每名被试讲解问卷填法并随时回答被试填写中出现的问题。问卷施测后由主试当场核查问卷。每位被试在调查后均获礼品一份。

1.4 数据管理及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15.0、AMOS9.0对数据进行管理和分析。

2 结 果

2.1 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的歧视的状况

采用ANOVA对不同群体(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婚姻状况)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的歧视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详见表1):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三个变量的二维、三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性别、婚姻状况主效应均不显著;文化程度的主效应($F=6.71, P<0.05$)显著,初中及以下学历者感知到的歧视高于初中以上学历者。

表1 不同类型新生代农民工在感知到的歧视上的方差分析

		感知到的歧视	
		M \pm SD	F
性别	总体	2.58 \pm 0.04	0.97
	男	2.62 \pm 0.05	
	女	2.54 \pm 0.06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2.69 \pm 0.05	6.71*
	初中以上	2.47 \pm 0.05	
婚姻状况	未婚	2.51 \pm 0.03	2.50
	已婚	2.65 \pm 0.07	

注:*代表0.05水平显著,**代表0.01水平显著,***代表0.001水平显著

表2 歧视、社会支持、自尊、主观幸福感四者的相关

	歧视	社会支持	自尊	主观幸福感
歧视	1			
社会支持	-0.24**	1		
自尊	-0.42**	0.17**	1	
主观幸福感	-0.23**	0.22**	0.31**	1

2.2 歧视、社会支持、自尊、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对歧视、社会支持、自尊、主观幸福感四者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详见表2):歧视与社会支持、自尊、主观幸福感

呈显著负相关,社会支持与自尊、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2.3 歧视、社会支持、自尊、主观幸福感四者的关系

首先,检验歧视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结果表明,在没有社会支持、自尊时,歧视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显著($\beta=-0.23, P<0.001$)。

接下来,检验社会支持和自尊的独立的中介作用。以歧视为自变量,社会支持和自尊为中介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构建出两个中介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模型(图2);自尊的中介作用模型(图3),采用AMOS9.0对这两个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发现,这两个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其中“社会支持的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chi^2=10.02, df=4, \chi^2/df=2.56, GFI=0.94, NFI=0.91, CFI=0.94, RMSEA=0.06$;“自尊的中介作用模型”的拟合指数为 $\chi^2=3.4, df=2, \chi^2/df=1.69, GFI=0.99, NFI=0.94, CFI=0.99, RMSEA=0.04$ 。在“社会支持的中介模型”中,当加入社会支持变量后,歧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beta=-0.13, P<0.1$),同时歧视对社会支持($\beta=-0.32, P<0.001$)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eta=0.25, P<0.01$),Sobel结果为 $Z=ab/\sqrt{b^2 S_a^2 + a^2 S_b^2}=2.18$;在“自尊的中介模型”中,当加入自尊变量后,歧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不再显著($\beta=-0.06$),同时歧视对自尊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eta=-0.51, P<0.001$)、自尊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eta=0.26, P<0.001$)。这些结果表明,社会支持、自尊各自为歧视和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在歧视和主观幸福感中发挥中介作用。

最后,检验社会支持、自尊的共同的中介作用。依据图1提出的四者关系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采用AMOS9.0对歧视、社会支持、自尊、主观幸福感四者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详见图4),该理论模型拟和良好,其中 $\chi^2=12.72, df=6, \chi^2/df=2.12, GFI=0.94, NFI=0.94, CFI=0.97, RMSEA=0.05$ 。在加入社会支持、自尊两个变量后,歧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系数不再显著($\beta=-0.05$),歧视对社会支持、自尊仍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beta=-0.32, P<0.001$; $\beta=-0.34, P<0.001$),社会支持、自尊仍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eta=0.21, P<0.05$; $\beta=0.23, P<0.01$),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要高于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同时,和单独考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时相比(图2),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系数有所降低($\beta=0.21, P<0.01$),其部分

影响效用为自尊所中介,其中社会支持对自尊影响系数为($\beta=0.15, P<0.01$),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为($\beta=0.23, P<0.01$), Sobel 检验结果为 $Z=ab/\sqrt{b^2S_a^2+a^2S_b^2}=3.33$ 。这表明,当考察社会支持、自尊共同的中介作用时,歧视除了分别通过社会支持、自尊来影响主观幸福感外,歧视还通过“歧视→社会支持→自尊→主观幸福感”这样的路径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同时和社会支持相比,自尊是更为核心的中介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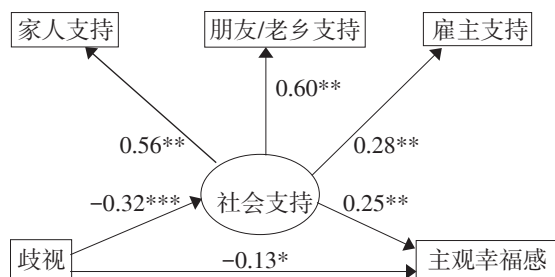


图2 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的歧视对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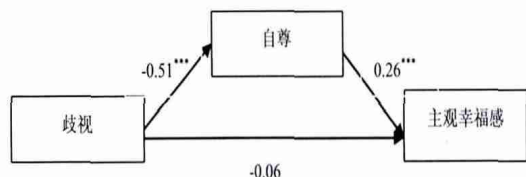


图3 自尊作为中介变量的歧视对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方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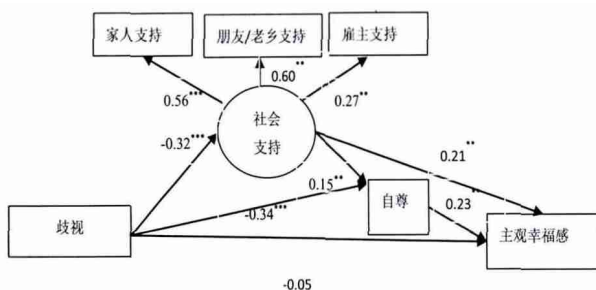


图4 歧视、自尊、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四者的结构方程图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验证了歧视拒斥理论的观点,为歧视拒斥理论提供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实证研究依据。同时,和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不仅考察了社会支持和自尊的单独作用,还对他们的共同作用进行了考察,明晰了各自在歧视与心理健康中的作用方式,这有效的弥补了已有研究的不足,也从环境到个体步步深入的解释了歧视的作用机制,加深了人们对于歧视影响作用的理解。

为什么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歧视会通过上述

路径作用于主观幸福感?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点可以对此做出很好的解释。已有研究表明,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如下特点^[21]:年龄偏小,平均年龄仅有23岁;具有较高的学历和较少的务农经历,对城市生活有着更高的期待,也有着更高的城市融入欲望。由于他们有着更高的城市生活的期待,城市中的歧视会让他们产生更强的疏离的倾向,从而失去建构城市社会支持系统的机会。同时因为他们普遍年龄较小,其自尊发展尚处于他人的评价和意见具有重要影响的“自为自尊”阶段。已有研究^[22]表明,“自为自尊”的个体会以自己所具有的社会资本及社会符号来评价自己的能力,以各种社会行为和活动来进一步实现自身的价值性。拥有较高的城市融入欲望让城市人的看法和意见以及与城市人的关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建构自尊的重要来源,但歧视带来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损伤却无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高自尊的动力和支持,这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自尊,从而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故此,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歧视会呈现出如上所说的作用方式。

参 考 文 献

- 1 《人口研究》编辑部. 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 人口研究, 2010, 34(2): 31-56
- 2 张居永.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与心理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岭南学刊, 2012, 1: 103-107
- 3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江苏纺织, 2010, 8: 8-11
- 4 高福海, 李平, 江雯.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状况的调查分析——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部分企业为例. 中国青年研究, 2012, 1: 52-55
- 5 林晓娇.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现状考察.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 23(4): 35-38
- 6 李喜英. 我国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制度性研究. 西北工业大学, 2005
- 7 章洵. 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512名农民工为例. 社会工作, 2007, 5: 48-51
- 8 胡伟, 王芳, 马丽霞, 林丹华. 歧视知觉、逆境评价和流动人口心理适应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20(5): 679-683
- 9 蔺秀云, 方晓义, 刘杨, 兰菁.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 心理学报, 2009, 41(10): 967-979
- 10 Prellow HM, Mosher CE, Bowman MA. Perceiv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mong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 2006(32): 442-454

(下转第1021页)

- chology, 1995, 68(4): 653-663
- 9 Kwan VSY, Bond MH, Singelis TM. Pan-cultural explanations for life satisfaction: Adding relationship harmony to self-este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3(5): 1038-1051
 - 10 Chang WC, Osman MMB, Tong EMW, et al. Self-constru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two ethnic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Psychology*, 2011, 2(2): 63-70
 - 11 Brewer MB, Chen Y. Where(who) are collectives in collectivism? Towar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7, 114(1): 133-151
 - 12 Cheng C, Jose PE, Sheldon KM. Socio-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elf-constru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test of four cultural model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11, 42(5): 832-855
 - 13 Lu L. Culture, self,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Psychologia*, 2008, 51: 290-303
 - 14 Lu L, Yang KS. The emergenc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traditional-modern bicultural self of people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i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6, 9(3): 167-175
 - 15 李志勇, 吴明证. 大学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自我和谐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3): 346-348
 - 16 郑雪, 严标宾, 邱林, 等著. 幸福心理学.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 182-183, 53-65
 - 17 黄任之, 刘明矾, 姚树桥, 等. 自我结构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应用的信效度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3): 306-308
 - 18 江向东, 王希林, 马弘, 等.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19 Lu L, Gilmour R, Kao SF, et al. Two ways to achieve happiness: when the East meets the West.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1, 30(7): 1161-1174
 - 20 Markus HR, Kitayama S. Cultures and selves: A cycle of mutual constitution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5(4): 420-430
 - 21 Lam BT. Self-construal and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among Vietnamese-American adolescents: An examin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elf-constru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006, 30(1): 67-75
 - 22 段洋, 陆柯雯, 任孝鹏. 自我与幸福感: 关系和谐、自尊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2): 317-319
 - 23 Pouliazi K, Verkuyten M. Self-evaluatio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cultural context: The changing Greek societ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11, 42(5): 875-890

(收稿日期: 2013-05-06)

(上接第1016页)

- 11 Cassidy CRCO, Howe C.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e role of personal and ethnic self-esteem.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4, 51: 329-339
- 12 胡美娟, 彭文波, 杨允, 疏德明. 当代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自尊、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心理科学*, 2011, 34(6): 1414-1421
- 13 孔凤, 王庭照, 李彩娜, 和娟, 等. 大学生的社会支持、孤独及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 *心理科学*, 2012, 35(2): 408-411
- 14 Heppner HP. Maladaptive coping and self-esteem as mediators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0, 48: 469-474
- 15 申继亮. 处境不利儿童的心理发展现状与教育对策研究.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179-180
- 16 刘霞. 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 特点、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 2008
- 17 Richard D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phenomenological impact of social stigma.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1, 141(2): 174-189
- 18 Ward C, Kennedy A. The measurement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99, 23(4): 659-677
- 19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318-320
- 20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79-80
- 21 周莹. 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代际比较研究——基于W市调查案例的实证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 2009, 3: 54-58
- 22 丛晓波. 自尊的本质.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收稿日期: 2013-06-24)